

丁钢
◎ 著

中国 佛道教育比较研究

本书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佛教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源流和主要特点，并从比较文化的角度，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对儒佛道三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方法进行纵横向比较和关系研究。力图为中国教育史研究提供新的角度、观点和方法。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丁钢◎著

ZHONGGUO FOJIAO JIAOYU
RUFODAO JIAOYU BIJIAO YANJIU

中国佛教教育

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丁钢著.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408-5305-1

I. ①中… II. ①丁… III. ①中国-佛教教育：比较教育-儒家、佛教、道教 IV. ①B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7226 号

责任编辑 陈蜀蓉
封面设计 梦幻四人组
版式设计 王 凌
责任校对 喻小红
责任印制 黄 萍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成都前智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成品规格 168mm×240mm
印 张 14 插页2
字 数 280千
印 数 1-2000册
定 价 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调换。电话：(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028) 86259477 邮购电话：(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028) 86259381

P r e f a c e

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结构。

它主要由儒家文化、道家（或道教）文化和佛教文化构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史中，儒家文化是正统，道家（或道教）文化是异端，而佛教文化则是外来的鲜货。然而，文化发展的规律证明，凡是适应社会生活需要的一切文化成果是可以并行不悖、彼此相容的。在这前提下，不同的文化可以有各自的独立性，但也可以相互吸收和融合。中国文化的历史正是如此。儒家注重人伦，道家崇尚自然，佛教提倡出世，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满足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共同需求。因此，在彼此的斗争与融合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甚至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

与此相适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教育也是一个多元结构。它主要也是由儒家教育，道家（或道教）教育和佛教教育构成。儒、道教育历来受到中国教育史界的关注，佛教教育却由于它的宗教性质而甚少有人注意。实际上，每种文化都是由人类创造的，文化的流传是通过人类一代一代相继延续的，而文化的延续绝对离不开教育的传递。因此，佛教文化的传递也必然由一定的教育形态来保证，于是就有了佛教教育的出现。

中国佛教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教育紧密相关的。它起始于东汉，是在适应儒道教育的基础上兴起的。由于它以精致的教育思想，以及对教育心理与思维训练的注重，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输入了新血液，因而得到一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政治社会种种因素的促动下，佛教教育不断地迎合和吸收儒道教育，在长期的融合过程中，逐渐分离出一个具有中国化特征的佛教教育体系，在教育制度、思想、方法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儒道教育的进程与方向。至隋唐，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从教育制度、思想和方法等一系列方面全面确立了中国佛教教育的体系，广泛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它在近代有了新的发展，

而且垄断中国某些少数民族（如西藏、云南傣族等）地区的教育。

中国佛教教育的历史说明，它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具备一整套完备的体系，而且事实上，它的产生与发展已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儒道教育的吸收和影响，历史早有明证，它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乃至文化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是无法忽略的。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三教教育的历史地位不尽相同。由于满足封建政治伦理需求上的程度不同，一方面构成了以儒家教育为主流，佛道教育为补充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封建社会的变动沉浮，三教教育此起彼伏，又形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

由此，在研究中，一方面要采用比较教育研究的一般方法，即跨国性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接触史来比较研究佛教教育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教育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摸索一种探求在同一国度文化环境中各种不同教育形态、体系之间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方法。

本书就是从以上的思考角度和方法出发所作的一项新的尝试。它力图通过对中国佛教教育发展史的纵向考察，以及与中国传统儒道教育的横向比较，以期为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观点和方法。这种尝试无疑面临着众多的困难。然而，正是这种种的困难激发了作者探索的兴趣，并将此引以为己任。因为，对于一位青年学子来说，有什么能比攻克难关更令人神往呢！

作者

1986年冬日于沪上

P r e f a c e

再版前言

20年后再版的《中国佛教教育：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曾在1988年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可谓是我在教育文化方面研究的早期著作。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进行这项研究，一方面受到我国当时文化研究热潮的感召，另一方面也与自己的学习经历相关。我在大学本科学习哲学期间，对佛教思想文化历史认真研习过一段时间，积累过一些资料；而在读文学硕士学习期间，又认真地研习过道教思想文化历史；故而，在进入教育学博士学习期间，在研习儒家思想文化和教育历史的基础上，萌生了进行跨学科性质的文化教育研究工作的兴趣。也正是这项研究的开展，形成了自己在教育文化及其历史研究的开端。

我在1985年至1986年期间进行的研究工作，是从先秦儒道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开始的，这实际上形成了我后来的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先秦以后的中国教育文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东汉以降的佛家文化。于是，几乎同时，我的研究开始转向中国佛教教育和儒佛道教育比较研究。

此领域的研究，应该说受启于一些前辈的研究，如陈东原先生的《中国教育史》（1935）和周予同先生的《中国学校制度》（1931），或程舜英先生的论文“佛教对中国教育和书院制度的影响”（1986）等，尽管前者所涉文字仅寥寥几十字，后者是万字左右文字，但还是自己萌发作此系统研究的重要起因。除此之外，在本成果出版之前国内学界几无涉及，国外学界也没有类似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过程中，我重新梳理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相关史料，并汲取了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力求客观地去研究中国佛教教育的发生和发展历程，探索中国佛教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提出中国佛教教育的一个较为系统的历史框架。同时，考虑到佛教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关系而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即一方面采用比较教育研究的一般方法，即跨国性、跨文化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外来文化

与本土文化的接触史，来比较佛教教育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教育的关系；另一方面，采用一种探求在同一国度文化环境中各种不同教育形态、体系之间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方法。另外，也采用了陈垣先生所倡导的历史研究方法，用外证和内证的比勘方法对中国佛教教育的史料和儒道两家教育史料进行仔细的发掘和比较。

在本研究进行时，佛教大藏经和道藏还没有影印出版，能供参考的用新式标点整理出版的只有还未出版齐的若干佛教哲学思想资料，而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有关中国教育史研究的资料和著作中，都几无涉及佛道教育的史料和研究，此项研究面临史料发掘上的极大困难。我主要立足于儒佛道，尤其是佛、道原始典籍的研读，探究和发掘佛、道两家与中国教育历史相关的重要史料，并将三家的史料加以比较分析，另外还仔细阅读了各研究大家如梁启超、熊十力、吕徵、汤用彤、陈垣、蒋维乔、赵朴初、任继愈、郭朋、王明、卿希泰等的著作，并将两方面的史料和儒佛道三家的资料结合起来加以认真研究，由此为本书撰写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众多重要的历史资料。

此书中，我将中国传统教育视为一个多元文化结构，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佛教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源流和主要特点，并从比较文化的角度，从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对儒佛道三家的教育思想、制度和进行了纵横向比较和关系研究，力图为中国传统教育为多元互补结构的发展理论奠定基础，为中国教育史研究提供新的角度、观点和方法，并对其后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以及中国教育研究的多元文化视角的开拓形成一个重要的研究取向。主要的发现在于：

一、突破了原有中国教育史一元论的研究路线（即主要关注儒家教育），进而关注佛、道教育思想的发掘，以及在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儒、佛、道教育思想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构成中国教育的多元结构和整体面貌的。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特

定历史环境中，由于在满足社会政治伦理需求上的程度不同，不仅构成了以儒家教育为主线、佛道教育为补充的局面，而且随封建社会的变动沉浮，三家教育此起彼伏，又形成了交错互动发展的复杂历史图景。

二、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佛教教育的体系，将起始于东汉时期的中国佛教教育，纵向贯穿至民国时期，横向关系到汉族和藏、傣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教育。在发掘大量新史料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中国佛教教育教学制度发生发展的过程和具体运作方式，以及佛教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全面比较了中国佛教教育教学思想、制度与儒、道教育之间的发展关系。

三、仔细比较研究儒、佛、道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指出儒、佛、道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融合，始于魏晋而大成于宋明。提出三家教育思想在隋唐和宋明时期的会合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的根本特征。佛、道教育思想是隋唐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宋明理学教育实是这种混合的结果。佛、道教育思想改变了儒学教育的原来方向，宋明理学家们总结了三家在长期融合过程中的经验，在整合的基础上重新树立了儒家形象。宋明理学教育是三家教育思想一体化的产物，它构成了一种新的教育意识形态，从而在保存了儒学教育的内核中，完成了三家融合的工作。

此书曾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0）、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二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奖（1991）。1988年出版后，引起了海内外的良好反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4期著名学者方立天教授在“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认为本成果“视角独特，数据丰富，迭有新意，对了解佛教，全面深入研究佛教，有着重要的意义”。魏承思在其所著的《中国佛教文化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中国佛教教育”一章中，注明主要参考了本书，并说明该章第3节“书院与禅院”完全采用了本书第5章“禅林讲学制度”的全部内容。本书也被如

英国伦敦大学亚太学院等诸多世界重要大学机构列为参考书。在学术影响方面，国际知名学者如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教授在其著作*China's University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6)，引用了本书的一些观点；美国南加州大学B. Elman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A. Woodside教授主编的*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也引用了本书观点。在国内教育学术界的影响：如在2000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李国钧、王炳照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2卷中，注明引用和参考了本书的资料和观点；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特邀我为新增“宗教教育”类300余条目的负责人，成为该辞典的特色之一；由李国均、王炳照、李才栋主编的《中国书院史》对本成果进行了援录和引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由李国均等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教育论著丛书》也间接受本书影响，增加了佛教和道教的相关教育史料。

鉴于本书多为国内外学界所评论和引用，并自出版20年来未见国内外同类著作的出版，四川教育出版社将其重版，此实为吾之幸事。为保持原有的学术风貌，本次重版只是作了一些资料和文字订正，如有不当，还望各位方家指正。

作者识于沪上

2009年8月8日

Contents

目 录

前言 / 001

再版前言 / 001

第一章 佛教教育的兴起 / 001

- 一、伊存授经：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 002
- 二、讲学以译经——佛教教育的初兴 / 006
- 三、东汉帝侯的隆佛与教育 / 010
- 四、早期佛教教育思想剖析 / 013
- 五、“禅定”与“守一”：佛道教育思想比较 / 019

第二章 融合与分离（上） / 027

- 一、三教融合与佛教教育 / 028
- 二、牟子、康僧会三教一致的道德修养论 / 035
- 三、由朱士行到法显：求法留学运动之始 / 038
- 四、讲学之风大盛：南北两大中心——长安与庐山 / 043
- 五、名僧与名士：寄寓于玄谈中的佛教教育 / 047
- 六、竺道生对佛教教育的影响：佛性说与顿悟说 / 052

第三章 融合与分离（下） / 061

- 七、南北朝学校制度中的佛教教育 / 062
- 八、僧尼制度与寺院教育 / 065
- 九、都讲制度与复讲制 / 068
- 十、其他教学形式的演进及对儒家的影响 / 073
- 十一、比丘尼教育的兴起 / 082

√

第四章 全面确立时期 / 087

- 一、隋唐的宗教政策与佛教教育 / 088
- 二、隋唐佛教的传授制度与教育 / 096
- 三、佛教讲学仪式的确立与俗讲的出现 / 102
- 四、玄奘：求法留学运动的再兴 / 108
- 五、隋唐三教教育思想的比较 / 112

第五章 禅林讲学制度——寺院制度与书院制度比较 / 123

- 一、禅林与书院的组织形式 / 125
- 二、寺院清规与书院学规 / 135
- 三、寺院与书院的教学活动及其特点 / 142

第六章 余绪与发展 / 155

- 一、概述 / 156
- 二、明代佛教教育思想与外学 / 157
- 三、清末民初的寺产兴学之争与寺立学校 / 165
- 四、居士佛学教育与近代思想 / 169
- 五、民元以后佛教专门学校的创办 / 175

第七章 中国少数民族的佛教教育 / 183

- 一、云南傣族的佛教教育 / 185
- 二、西藏地区的佛教教育 / 190

附录 / 201

- 中国佛教的宗教美育 / 202
- 中国佛教教育在国外 / 210
- 参考文献 / 213

后记 / 再版后记 / 216

第一章

佛教教育的兴起

- 伊存授经：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 讲学以译经——佛教教育的初兴
- 东汉帝侯的隆佛与教育
- 早期佛教教育思想剖析
- “禅定”与“守一”：佛道教育思想比较



一、伊存授经：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一般来说有两条路线。^①一是南传佛教。这是当时印度阿育王举行佛教第三次结集后，由印度向南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家的佛教，我国南境所传佛教，就在这波及范围之内。二是北传佛教。由于南传佛教传入中国比较晚，从历史上看，中国实为北传佛教中心。公元前三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大兴佛教，加强对外的弘传。印度佛教也逐渐流传于印度西北地区。当时的大夏、安息等国一个个地加入了佛教文化圈。

大夏国在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于公元前三世纪下半叶独立建国，深受希腊文化影响，在公元前约130年被大月氏征服。公元一世纪大夏的新统治者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印度西北部，此后大夏成为佛教的一个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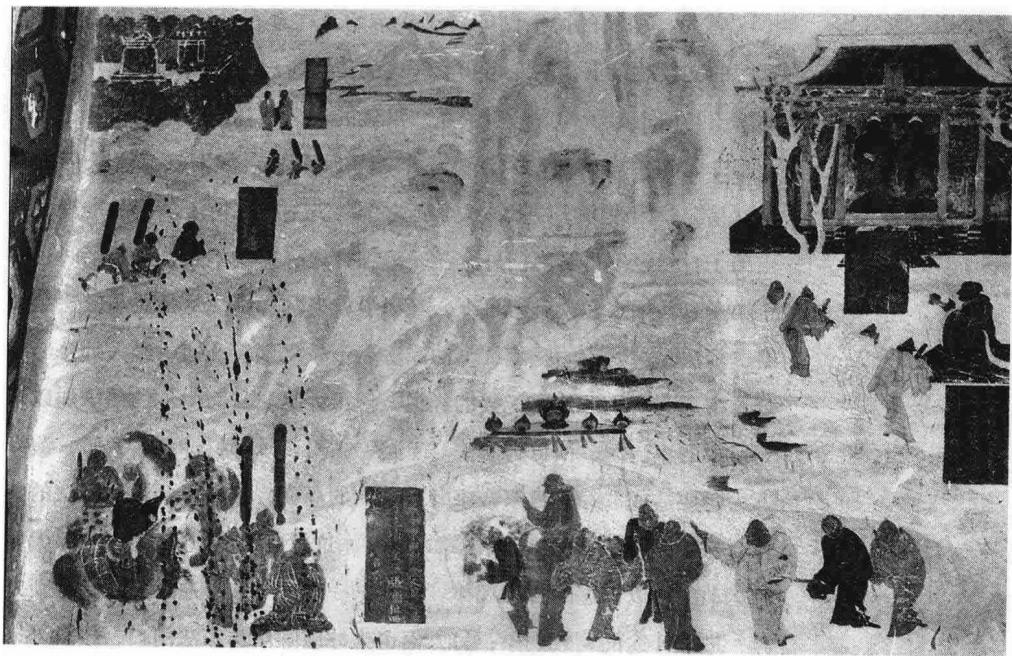
与大月氏建国几乎同时，汉武帝派遣张骞等人出使西域的来往日益频繁。西汉末年西域各国来华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逐渐增多。

这不仅沟通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生产技术、商业贸易方面的来往，并且为思想文化的交流铺平了道路，提供了渠道。一种新的文化接触开始了。佛教文化也在此时开始传入汉地。关于北传佛教对中国的渗入，从现有的文字记载来看，传说不下十多种，但大多荒诞不经，讹

①据今学者考证，认为主要路线约有三条：一由印度，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来；二由海上丝绸之路，经中南半岛传来；三通过西南丝绸之路，经缅甸传来。参见宋肃渊：《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陈炎：《西南丝绸之路》，《中国建设》杂志（英文版）1986年9期。本文仍沿用通常说法。



图1.1.1
西夏文刻经 西夏



纸四出，不能置信。可其中有一条记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且同这里所要讨论的中国佛教教育的起始问题相联系。

在《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三国时魏国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

中国佛教史家一般认为，此段史料是印度佛教文化传华的最早的无可确实的文献记载。这说明在西汉末时印度佛教信仰已在社会上引起重视。但是，更使人感兴趣的是大月氏使者口授佛经予博士弟子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可以说，这绝非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事件，其背后蕴藏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为说明这点，就必须从汉时文化教育背景上去理解。

图1.1.2
张骞出使西域
第三二三窟
北壁 初唐



首先，西汉的博士制度自汉武帝始，在奉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文教政策下，就专为儒家经典的传授所设。在太学中，教授经典的博士与博士弟子构成师生关系。汉代的经学教育，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非常讲究守师法与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因改师法，就被太学拒之门外，不得立博士。据此推理，博士弟子自然也不得学习门外之学。但细究之，其实不然。汉昭帝时，博士弟子日益增多，说经者日众，经说也就越加严密。从师法与家法关系看，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师法家法是干枝之别。凡通一经大师，经朝廷首肯尊为博士，他所传授的经说，便可为师法。而由他的弟子加以章句形成的小流派，便可为家法。于是，“虽曰承师，亦别名家”，演绎下去，便造成“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局面，结果是师法与家法的不攻自破，不能不出现超越樊篱的现象。这反映出文化发展在内部矛盾的运动中得以长进的自身规律。如此，一方面导致了通经立说，标新立异，进取仕途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也为冲破师法与家法门户，接收外来思想文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由于官学的发展，汉武帝时博士弟子已增加到三千人之多。学生一多，教堂少和讲堂少的矛盾就突出。于是，大学的教育采取两个措施：一为安排正式课程，称为“正业”；一为增加课外的自修，称为“居学”。允许博士弟子向校外的学者讨教学习，客观上也为接受经学之外的思想文化提供了制度上的条件。

再次，自秦以来，方士幻术盛行，在方士与儒生的共同推进中形成的谶纬神学更是广泛流行于两汉之际，成为一时的风尚。这种文化背景也为佛教的传入铺垫了道路。

以上三方面的背景，说明了佛教文化传入的文化基础，以及佛教教育的可能性。

从前引史料记载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引文中曰“复立”者，可能即《世说新语》注引文中的“复豆”。《酉阳杂俎》卷二“汉所获大月氏复立经”之谓，当即指“复豆经”。“复豆”者，与“浮屠”同音，即“佛陀”（Buddha）。在佛教流行后，《复豆经》才改为《浮屠经》。从书名上看，很可能是如以后《本起经》《本行经》之一类专讲

佛陀生平的经。据汤用彤先生考证，魏世似已收有不少佛经，而《浮屠经》当有不同的译抄本，^①但处早期译经阶段，故用词很不规范。引文中所谓佛陀弟子的称号，除临蒲塞（后译为优波塞，即居士）外，可看做是魏世各种译抄本对“沙门”“比丘”的不同译法。

佛教的《本起经》《本行经》之类

的佛经，在叙述佛陀一生的故事上，充满神秘的宗教意味。如说佛陀的出生是其母摩耶夫人梦白象而怀了孕，佛陀从母亲的左肋出生，刚刚坠地便能行走七步等等。这种宗教性的渲染，恰与西汉当时谶纬盛行的神秘主义气氛相吻合。从比较文化角度来看，一种外来文化的移入，必须具备与这种文化接触的适应性土壤。当时的知识分子经学大师们也不断地变幻学说，演绎神学，这就给予佛教这种宗教文化的移入提供了精神上的土壤。因此，作为太学学生的博士弟子能够接触《浮屠经》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从中国佛教教育的起端来考虑的话，也可以看出有以下三个特点：

1. 中国佛教教育肇始于僧侣主义的宗教信仰，而非后来的义学。这与西汉今文经学的发达及谶纬神学的流行的现实情况相符。

2. 中国佛教教育最早出现于上层知识分子阶层。博士弟子属国家官学系统的学生。这种宗教教育可能主要是通过西汉与西域交通中来往的使者官员来传播，并且这种宗教文化很可能只限于一种神秘主义的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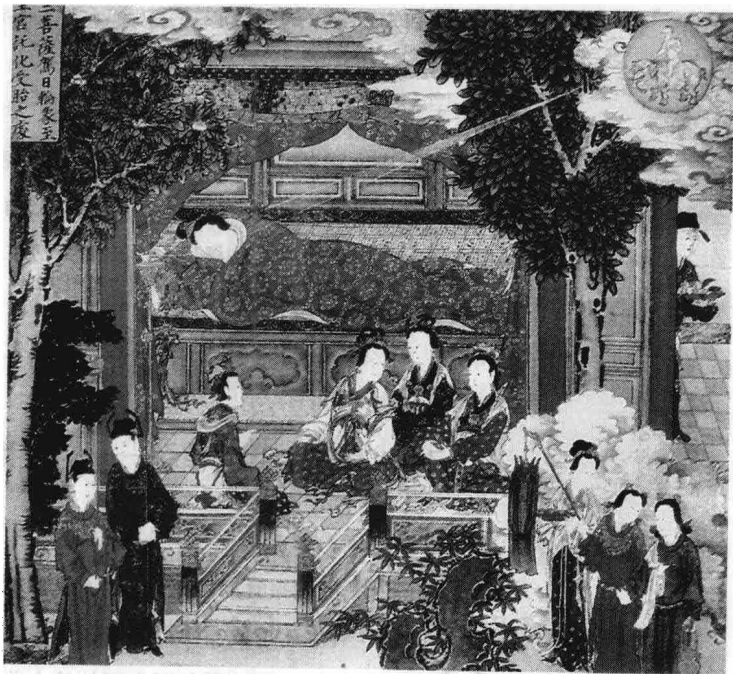


图1.13

梦象受孕 壁画

中国山西崇善寺
佛陀的诞生与其他宗教教祖，甚至帝王的诞生一样，有许多神话传说。白象在印度神话中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龙。佛陀母亲摩耶夫人梦见白象从自己右肋进入身体。妊娠的喜悦、惊奇和恐怖带来的反应，使这个王后产生的幻觉与佛陀本身的伟大相符，于是便有了千古圣人。

①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一分第四章《汉代佛法之流布》。



教内容和知识分子的好奇心，并没把它看做一种知识文化系统来接受，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而已。

3. 口授佛经是当时佛教的传统方法，因为在公元前一世纪前，佛典还未有成文记载，全凭口头传诵。这与西汉太学从师口授的方法相契。我国早期译经，也多从口授。这种口授的教学方法与太学教学方式相结合，在以后的译经传播过程中，便形成了口授实录的中国早期佛教教育的基本特征。

二、讲学以译经——佛教教育的初兴

中国佛教的初兴时期是在东汉。作为佛教本身，其发展的基础基本

是依靠佛经的传译和讲习为媒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佛教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产生了一系列的涵化现象，逐渐奠定了中国佛教文化的社会基础以及理论根基。佛教的宗教教育的初兴，亦起端于此。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东汉时期及其以后佛经的传译对于佛教教育的促进作用，恰恰是其蕴含了佛教教育的发展因素，并且在以后佛教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佛教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佛教理论传译活动的真正开端，应该是在汉桓帝与灵帝统治期间。由于在汉初明帝时已为西域来的僧人建立了一些寺院，到汉桓帝时，在朝廷的支持下，佛教在中国开始站稳了脚跟（详见下节）。接踵而来的便是，大批学问僧涌入中土，开始了初具规模的佛经传译活动。当时来华西域学问僧，据历史记载，主要有如下一些人：

安清，字世高，号称安侯，原为安息国王太子。“后王薨，将嗣国位，乃深悟苦空，厌离名



图1.2.1
安世高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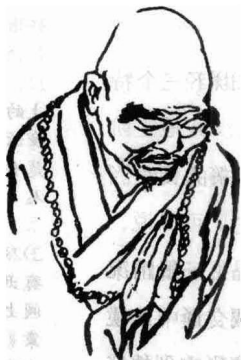


图1.2.2
支婁迦讖像